

多模态视角下的中医药类纪录片的文化认同建构策略 —— 以《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为例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Culture Identity in Chinese Medicine Document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 A Cas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ighting Against the Epidemic”

程中芳*

叶俊杰**

Amirah MOHD JUNED***

(CHENG Zhongfang) (YEAP Chun Keat)

摘要

本研究主要从多模态话语分析角度探讨纪录片《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的文化认同建构策略，研究资料来源于CCTV中文国际频道的一档电视访谈栏目《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以张德禄教授提出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和多模态协同理论为指导，使用定性方法对此进行分析，分析了多模态话语在纪录片中的应用，并从文化记忆的唤起、文化情感的激发和文化价值的彰显三个层面探讨了纪录片中各个模态是如何协同构建文化认同的。研究发现，在多模态视角下纪录片的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中：一、在文化记忆的唤起层面，疫情背景下纪录片中背景音乐模态、图片模态和解说词语言模态一起共同构筑了一个个生动的抗疫故事，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医药文化的了解，唤醒了人们的中医药文化记忆；二、在文化情感的激发层面，文化符号的传递、视角距离的拉近以及方言共情一起实现了共同意识的打造，激发了人们对于中医药的文化情感；三、在文化价值的凸显层面，多景别镜头的互补运用，既凸显了中华医药的历史厚重与庄严，也蕴含了生命至上、命运与共的中国民族抗疫精神和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的文化价值和内涵。

关键词：文化认同、中医药、中医药纪录片、抗击疫情

* 程中芳（第一作者） 亳州学院外语系讲师、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马六甲亚罗牙也分校语言研究学院博士生。电邮地址：snowywinter2024@163.com

** 叶俊杰博士（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马六甲亚罗牙也分校语言研究学院高级讲师。电邮地址：chunkeat@uitm.edu.my

*** Amirah MOHD JUNED（第三作者） 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马六甲亚罗牙也分校语言研究学院高级讲师。电邮地址：amirahjuned@uitm.edu.my

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s the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the documentary “Chinese Medicine Fighting the Epidem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research data came from the TV interview program “Chinese Medicine Fighting the Epidemic” of CCTV Chinese International Channel. Based on a synthetic framework for multimodal discourse and the modal synergy theory proposed by Professor Zhang Delu,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in the documentary is analyzed an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documentary are explored at three levels: the arousal of cultural memories, the stimulation of cultural emotions,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cultural values,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are used to ensure the research.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documentary from multi-modal perspective: 1. At the arousal of cultural memories level, the background music modality, the picture modality and the narration language modality in the document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pidemic together constructed a vivid anti-epidemic story, which deepen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awakened people’s memory of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Second, at the stimulation of cultural emotions level,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symbols, the perspective distance and dialect empathy together realize the creation of a common consciousness and stimulate people’s cultural emotion for Chinese medicine; Third, at the manifestation of cultural values level, the complementary use of multi-scene lenses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historical heaviness and solemn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ut also implies the cultural valu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spirit of resistance to the epidemic,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great cohesion of Chinese nationality in which the supremacy of life and destiny is shared together.

Keywords: Cultural identi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documentary, fighting the epidemic

前言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医药纪录片《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是在特别时刻应运而生的。而作为中医药纪录片，它兼具纪录片和中医药类文化宣传片的特质。纪录片具有真实性、独特性和人文性特征，而作为特殊时期的中医药纪录片的代表，它不同于以往的中医药类纪录片，较多侧重于讲述中医药历史和中医药文化，而此纪录片侧重于中医文化的传承、创新和中医在抗疫实践中的应用。该纪录片以叙事体的形式向大众讲述了中医抗击疫情的典型案例和中国抗疫故事，向海内外观众展示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片中朴实而多变的画面，普通话旁白和地方特色中医方剂介绍和中医专家的采访，鲜亮或暗淡的颜色，充分体现了媒体话语或视频话语的模态形式，该纪录片一经播出后，引起了广大反响。它与以往的中医药纪录片不同。它通过中医药在抗疫中的实践应用与中医抗疫故事传播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文化。传统的中医方剂结合创新临床应用，朴实而感人的中医抗疫故事是纪录片获得很大成功的显性原因，而深层次原因是中华民族传统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与凝聚力。

多模态话语作为话语发展的新形式,已经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但其应用研究语料多以静态语篇如海报、漫画、诗歌等为主,而影视等动态语篇的分析较少,而在纪录片语篇方面的应用则更少。笔者通过查询资料发现,中国对纪录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角度,也有一些从从话语分析、翻译、语用学、摄影和历史角度。国外对中国题材纪录片也有研究,但大都从西方思想、观念和美学来进行阐释,不能客观地反映纪录片作为媒体资源的语篇构建策略和意义。纪录片有记录历史、反映社会生活、传播知识和构建时代精神等功能。目前语言学家对纪录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和交际方面。中国对纪录片的研究主要从话语分析角度、翻译和语用学角度来研究纪录片。例如龙菲(龙菲,2021)在纪录片《我们这五年》解说词的运用策略研究中,以纪录片的解说词为研究对象,运用语用学相关理论,以解说词文本为研究语料,通过纪录片解说词的叙事,语篇,语用预设进行分析和研究,总结归纳出纪录片解说词的语用策略。赵一(赵一,2022)在纪录片《同心战“疫”》中家国情怀的多模态话语研究一文中通过对纪录片的场景、语言、音乐等符号资源进行定量分析和选取典型语料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发现此纪录片中家国情怀的建构主要以解说词和场景为主导性符号资源,而多种模态的强化互补性的协同关系能够对家国情怀的构建起到推动作用。陈静雯(陈静雯,2023)在多模态视角下纪录片字幕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一文中,以《武汉战疫纪》为例,探索纪录片字幕翻译方法,最后通过这些样本进一步归纳该片所建构的具体国家形象。综上所述,中外学者从多模态视角研究纪录片媒体话语分析的资料不多,更不用说医药类纪录片了,而中国国内研究医药类纪录片的文献资料大都是从传播学和翻译视角来研究的,没有从话语分析视角来探讨的,以《中华医药 共抗疫情》为话题的论文资料只有少数5篇,而且是从口译,叙事视角,跨文化传播学角度来写的。如张洋涛(张洋涛,2023)在电视节目《中华医药抗击疫情》模拟交替传译实践报告一文中选择此电视节目的第一集进行中英模拟交替传译,通过典型案例分析,阐述了译者在释意理论指导下所采取的口译方法和策略。刘晴文(刘晴文,2022)在模拟交传中的记忆困难与应对策略-央视纪录片《中华医药抗击疫情》口译实践报告一文中以纪录片的口译实践为基础,围绕口译记忆展开研究,有针对性地探讨口译实践中如何应对口译记忆困难以及如何提高口译记忆能力。付玉(付玉,2022)在讲好抗疫故事:《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叙事范式研究一文中采用叙事范式理论研究纪录片如何讲好抗疫故事,为新闻媒体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借鉴意义。郭旭(郭旭,2021)在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互文性与身份建构研究一文中以互文性理论为视角,结合Van Dijk的“社会-认知”方法,构建适合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探讨纪录片中主持人、中医药专家和患者如何借助话语互文策略建构中医药身份,进而阐释相关社会认知因素。罗泽君(罗泽君,2021)在如何做好中医药文化工作,以《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特别节目为例一文中以此节目为例,分析了如何做好中医药的文化传播工作。而作为医药类、纪实类媒体资源,中医药纪录片《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在传播中华医药文化,讲述中国故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从多模态视角来探讨此纪录片的中医药文化建构策略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通过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以纪录片媒体资源《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为典型例子进行分析,解读中医药文化纪录片中的文化认同与建构策略。这不仅有利于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宣传与传播,增加文化自信,更进一步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也有利于我们在制作地方文化宣传片时,通过多模态的形式来建构文化认同,从而更好地了解和解读地域文化特点和内涵,从而增强地域文化传播和弘扬传统地域文化。

一、理论框架

(一) 多模态理论

近年来,随着多媒体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单一的文本模式的信息沟通和获取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已经逐渐进入到一个运用多模态进行日常交际的时代。然而,传统的话语分析理论关注于对话篇的语言进行分析,而忽视了对语篇意义的构建起重要作用的如图像、声音、颜色等其他模态所以多模态话语分析应运而生。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以Halliday (Halliday 1994: 60) 的系统功能语法为基础,并将其提出的三大元功能定义应用到语言之外的其他社会符号。Kress和Van Leeuwen (Kress和Van Leeuwen 1996: 25) 在《阅读的图像》一书中,提出了第一个用于对图像进行系统分析的框架——视觉语法,从而多模态话语分析有了具体的理论依据。

(二) 文化认同理论

认同的英文单词“identity”源自拉丁文idem,表示相同,同一性之意。认同就是指对共同或相同的东西进行确认、认可和承认。认同的过程就是进行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也是通过他人或社会进行寻找自我,反观自我的过程。那么什么是文化认同呢?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化认同有着不同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蒙和崔新建的定义。王蒙(王蒙,2013)认为文化认同是对一个群体或文化的身份认同,又或者是指个人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产生的认同感。而崔新建(崔新建,2004)的定义较为微观,他认为文化认同就是指人们之间对于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拥有共同的文化,往往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王蒙从宏观方面解读了文化认同感概念,而崔建新从微观角度定义了文化认同依据的四个范畴,即:相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化理念、共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整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最深层基础。本文以崔新建的概念为界定,来探讨文化认同的具体实现途径。

(三) 张德禄的多模态协同理论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

多模态话语分析是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外众多学者也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做了相关研究,使该理论不断得到拓展,中国学者张德禄(张德禄,2009)在总结以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模态协同理论和多模态话语分

析的综合理论框架（如图1）。张德禄教授（张德禄2009：27）认为在多模态话语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课题是发现不同模态的媒体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共同实现讲话者要表达的意义。他认为使用多模态进行分析是因为单一模态已经无法满足形式多样的表达意义，与此同时，一般而言模态不止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而是伴随着多种模态。两种模态之间的关系分为“互补关系”和“非互补关系”。在互补关系中，一般分为强化和非强化关系，强化包括突出、主次和扩充，非强化则分为协调、联合和交叉，非互补关系包括交叠、内包和语境交叉，由于非互补关系只是一种客观存在，无法体现出各模态之间的协调配合所以在分析电视节目多模态协同关系的时候一般不分析模态之间的非互补关系。本文在分析《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纪录片中各模态怎么来一起构建文化认同的同时，将会运用模态协同理论分析各个模态之间是如何交互和协同配合的，主要是通过分析语言、图像、声音模态如何协同配合来建构文化认同的。张德禄教授（张德禄2009：26）提出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包括文化层面、语境层面、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探讨了多模态话语的形式和关系，以及多模态话语语法的建构。同时，本文在多模态话语分析在《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中的运用部分将根据此理论框架，从文化层面、语境层面、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分析纪录片《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的话语意义，通过综合分析其中各模态单独和综合的功能和作用，更好地挖掘各模态所传递的文化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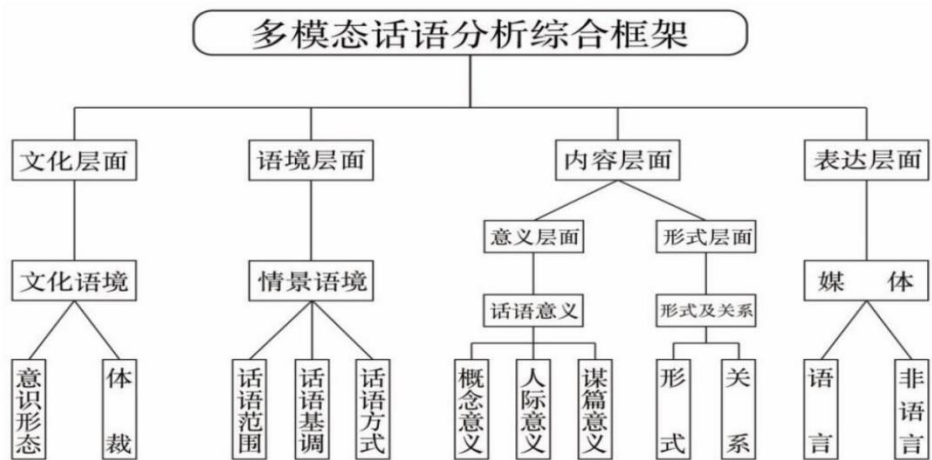


图1：张德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框架

二、研究动机

近年来，随着多媒体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单一的文本模式的信息沟通和获取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已经逐渐进入到一个运用多模态进行日常交际的时代。然而，传统的话语分析理论致力于对语篇的语言进行分析，而忽视了对语篇意义的构建起重要作用的其他模态如图像、声音、颜色等其他模态所以多模态话语分析

应运而生。多模态话语作为话语发展的新形式,已经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但其应用研究语料多以静态语篇如海报、漫画、诗歌等为主,而影视等动态语篇的分析较少,而在纪录片语篇方面的应用则更少。笔者通过查询资料发现,国内对纪录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学角度,也有一些从话语分析、翻译、语用学、历史、摄影和历史角度。国外对中国题材纪录片也有研究,但大都从西方思想、观念和美学来进行阐释,不能客观地反映纪录片作为媒体资源的语篇构建策略和意义。首先,在查找关于纪录片的文化认同相关研究时,笔者发现大多是以某个纪录片为例,来研究纪录片是如何进行文化认同建构的,很少有文章是从多模态话语分析角度来研究纪录片的文化认同构建策略的,而作为医药类、纪实类媒体资源,中医药类纪录片承载着中医药悠久的历史底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价值,在传播中华医药文化,讲述中国故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其次,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文化领域的发展和演变,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再次,中医药类纪录片是传播中医药类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节目吸引受众程度和传播效果与节目的多模态呈现和表达息息相关,因此从多模态视角来探讨此纪录片的中医药文化建构策略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对2020年3月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中医药系列纪录片《中华医药抗击疫情》内容从多模态话语分析角度对纪录片中的文化认同建构策略进行探讨,对所选取纪录片片段样本内容进行分析时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法、对纪录片中的语言模态进行分析时采用的是文本分析法,对整个纪录片分析采用个案研究法,在中医药纪录片电视节目中,选取它作为中医药纪录片的典型代表进行研究分析,先通过分析不同模态对文化相关信息的呈现与表达的作用,再通过不同模态之间的配合和协作对于纪录片文化认同建构的作用,进而归纳总结出适合于中医药类纪录片的文化认同建构策略。

(一)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语料来源于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在2020年3月份推出的7集专题纪录片,一至五集每集30分钟、第六集60分钟,第七集90分钟。这七个专题分别为:“清肺排毒汤”(2020-03-02)、“湖北保卫战·中医全力以赴”(2020-03-03)、“早介入重防控中医战‘疫’见成效”(2020-03-04)、“悬壶抗疫有中医”(2020-03-05)、“北京战‘疫’共盼春来”(2020-03-06)、“中西医结合·彰显中国智慧”(2020-03-14)和“中西医并重:阻击疫情的‘中国处方’”(2020-03-21)。本文主要是选取具有代表性能反映中医药文化内容的纪录片片段从多模态角度进行内容和文本分析,从而研究不同模态对文化内容的表达和呈现以及不同模态之间是如何共同协作来建构纪录片的文化认同的。

（二）研究框架

本文的整个框架分为三个部分，即从多模态话语视角的三个层面对纪录片中的文化认同建构策略进行探讨：一、文化记忆的唤醒层面；二、文化情感的激发层面；三、文化价值的凸显层面。在文化记忆的唤起层面，疫情背景下纪录片中背景音乐模态、图片模态和解说词语言模态一起共同构筑了一个个生动的抗疫故事，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医药文化的了解，唤醒了人们的中医药文化记忆；在文化情感的激发层面，文化符号的传递、视角距离的拉近以及方言共情一起实现了共同意识的打造，激发了人们对于中医药的文化情感；在文化价值的凸显层面，多景别镜头的互补运用，既凸显了中华医药的历史厚重与庄严，也蕴含了生命至上、命运与共的中国民族抗疫精神和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的文化价值和内涵。

四、多模态话语分析在《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中的运用

（一）从文化层面分析

文化语境层面是多模态语篇构建的基础，也是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关键，更是整个纪录片文化认同建构的核心要素。纪录片《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的文化背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层为时代文化背景，2020年初新冠疫情忽然爆发并很快波及全球给人们健康、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影响，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客观地讲述中医药抗疫故事，让海内外观众及时了解一线疫情发展和患者救治情况，有利于克服受众恐慌心理，能帮助人们形成对疫情发展的客观认识，对疫情的正确客观认识也有助于引导受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坚定全国人民战胜疫情的决心和信心。另一方面用讲故事的方式使冰冷的新闻和报道充满了感情和温度，通过展现一线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流动，也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从而拉近了纪录片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在当时武汉疫情肆意扩散蔓延的情境下，在西医没有特效药，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的情况下，继续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式和药物，这其中就包括中医药的治疗手段，新冠疫情爆发，药物筛选刻不容缓，作为克敌制胜手段，从古方中提炼出来的“清肺排毒汤”和来自广东的“肺炎一号方”等中药汤剂开始广泛应用于临救治病人。源自中华传统古方的中药复方“清肺排毒汤”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当时国际上有这样的声音：“清肺排毒汤”出来的太快了，十几天就上线了，真的可以治病么？当时已经入住方舱的病人也对中药汤剂疗效半信半疑。同时，社会上一直存在“中医无用”和“中医不如西医”的狭隘观点，这也是用一线中医疗效案例和对比数据说话，客观地对中医在抗疫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讲述，以实实在在的数据来正确引导受众的价值观，为饱受争议的中医药正名，让观众真实了解中医实际疗效和在疫情中发挥的实际价值和重要作用。

第二层文化层面则是关于中国中医药文化，中医中药历史悠久，早在几千年前的远古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在日常饮食劳作和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就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所谓的“神农尝百草”和“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从春秋战国时期扁鹊提出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秦汉时期出现的《黄帝内经》和《神农百草经》、东汉时期的《伤寒杂病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明清时期的《本

草纲目》、近代中医在西医和战火中求生存到现代中医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医药作为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瑰丽的宝藏和民族人文学科的丰碑。传承千年智慧,中医药治疗疾病屡见奇功,疫病总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相伴相生的,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52次重大流行疫病,最终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在现代医学在中国应用之前,中国历史上是靠中医来控制疫情,中医药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对抗疾病的有力武器。中医是打开中华文明的钥匙,这种文化自信和自觉性的力量是无法衡量的。

总之,在文化层面,纪录片中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由于中医药认知程度的不同产生了观念的冲突和碰撞,而故事发生的环境是:医院紧张有序的病房和其他视听语言等模态一起,共同很好地传递了有效信息,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能向观众呈现出中西医文化的异同以及中医药独特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探索中医药在疫情中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好奇心和热情。

(二) 从语境层面分析

在具体的语境中,交际要受到语境因素的制约,包括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所决定的语境因素(张德禄2009:28)。话语范围指的是语篇所涉及的社会活动;话语基调指的是交际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和交际意图;话语方式指的是交际的媒介或渠道(王楠2011:254)。文化语境的实现通过情景语境中的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等三个方面来实现。《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的三大语境因素可以描述为:(1)话语范围:通过中医中药抗击疫情的典型案例,向海内外观众展示中医药全力以赴的抗疫故事。(2)话语基调:纪录片文体较为正式,语篇中的言语角色是主流媒体向海内外观众提供中医药防治和抗疫信息,角色关系是媒体和海内外观众。

(3)话语方式:该纪录片属于访谈类纪录片,其中大部分内容以对话形式来呈现,总体结构为背景介绍、主持人访谈和嘉宾连线的方式,在叙事方式上采用内外视角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作为故事叙事主体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对于事件进行回顾性描述,更能体验到抗疫故事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变化和心理活动历程,从而拉近抗疫一线与观众距离,引起观众深刻的情感共鸣。从第二集“清肺排毒汤”古方新用显身手里主持人分别与一位山西治愈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曹先生和中西结合科的杨璞玉医生的连线对话来分析。主持人:曹先生,您!.....那您决定去看医生的时候,身体是出现了哪些症状呢?体征是什么样的?.....谢谢曹先生,非常感谢您。山西曹先生对“清肺排毒汤”印象最深的是改善了他的呼吸道症状而西安市第八医院中西结合科的杨璞玉医生从患者的肺部CT片上,看到了“清肺排毒汤”所显示的疗效。杨璞玉医生:这是一位44岁的一个女性患者的片子,她是1月29日入院的.....这个病人的临床表现就是乏力、胸闷、气短特别明显,然后我们就给他吃了“清肺排毒汤”,吃了半剂以后,患者胸闷气短就明显好转;吃了两剂以后患者症状基本就消失了,然后就和我们一起讨论什么时候出院.....吃了三服以后,她的肺部CT的一个表现,大家看到已经开始吸收了.....服6服以后....她的那个肺部这些病灶已经明显吸收,双肺的影像学表现大家看一下已经比较清楚了,她的那个核酸检测也两次阴性了,所以就可以出院了。从话

语范围角度来说，话语范围指的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语言发生的环境，包括谈话话题、讲话者以及其他参与者所参加的整个活动。这两段主持人和嘉宾的话语范围为用当事人或参与者角度讲述“清肺排毒汤”的疗效。话语基调为主持人与采访嘉宾的关系，主持人对于患者和医生都很尊敬，能够如实呈现嘉宾的感受和对客观事的陈述，并在嘉宾发言之后对其内容进行适时概括总结。话语方式指的是语言交际的媒介或渠道，即口语还是书面语，采用何种修辞方式等。新冠康复患者曹先生的发言比较口语话，汉语口头表达中信息冗余现象比较明显。而杨璞玉医生的讲述用的是书面语，关于患者肺部CT的描述中出现了很多医学专业术语，虽然专业性较强但在术语出现后杨医生专门对患者症状进行了解释，所以不影响观众对病情变化的了解。在两段连线采访中，主持人和嘉宾的发言符合人物的生活环境、说话地点和生活背景。从康复患者对现在感受的描述中，观众能感受到他确实恢复的不错，从医生对患者CT影像变化的讲解，我们也能感受到医生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以及对患者用药后病症变化的喜悦和成就感，这些参与者的真实心理变化与感受能让海内外观众感同身受，激发他们对中华医药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意识。

（三）从内容层面分析

在张德禄教授（张德禄，2009）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中，内容层面包括意义层面和形式层面。在话语意义层面，有由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所制约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在纪录片《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的行文叙事中，其内容层面传达了丰富的意义内涵，例如在第四集《悬壶抗疫有中医》中，在解释过去几千年前里古人是如何看待病毒并如何与它抗争的时候，视频旁白中台词“《说文解字》中解释道“疫，民皆疾也”，疫病始终伴随人类历史而存在。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52次重大流行疾病，最终都得到有效控制。”就与其对应的画面布局、听觉表现共同作用，达到了较为优秀的文化传播效果，表1分析其内容层面的话语形式及话语意义的处理。

表1：多模态话语内容层面分析

话语形式	语言模态	中文版台词：《说文解字》中解释道“疫，民皆疾也”，疫病始终伴随人类历史而存在。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52次重大流行疾病，最终都得到有效控制
	视觉模态	画面：古书籍《说文解字》、《中国疫病史鉴》和历史上抗疫情景画面
	听觉模态	旁白：短片配音演员 背景音乐：由管弦乐和管弦拨奏组成
话语意义	概念意义	表达中医历史悠久，人类历史和历史上的疫情相伴相生，加强人们对中医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解
	交际意义	向海内外观众传递了中医在历史抗疫诊疗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
	语篇意义	在视频短片中起到了从历史上中医在抗疫中的贡献过渡到如今的古方今用中医继续在抗疫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也暗示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塑造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形象的中医药文化形象

结合短片背景，中国抗疫场景画面在视觉模态中处于画面的中心，画面的左边是古籍《中国疫病史鉴》配合着短片配音演员的旁白：“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52次重大流行疾病，最终都得到有效控制。”以及管弦乐配合管弦拨奏组成的背景乐，体现了疫病与人类历史总是相伴而生，疫病从未远离过人类，而人类也从未被征服过，人类抗争疫情的历史，一直在持续中，体现出强烈的叙事性与画面感。而在话语意义方面，台词起到了对中医在历史上抗疫发挥作用的概括，在视频短片中起到了过渡作用，为下面的古方今用，在古方基础上创新研制出的中药方剂在各地抗疫中发挥中药作用奠定了基础。基于此层涵义也更能让海内外观众理解现代中医抗疫方剂如“清肺排毒汤”等不是短时间内创造出来的，它们有几千年的人类临床经验在里面，是根据古方来的一个组方的药，所以才会在短时间内起效果。在中华民族的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曾与疫病多次交手，通过发挥中医辨证施治，扶正祛毒，把人体正常机体能量调动起来，把人体的平衡调整好，使机体能够战胜病毒，在西医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国中医抗疫经验和智慧给世界各地人民战胜疫情又提供里一个有力手段。人类文明发展坎坷曲折，一代代医者舍身而出，去攻克那些疾病，中医药有5千多年历史，西医进入中国才有100多年历史，在现代医学应用之前，中国历史上是靠中医来战胜疫情的，如今中医依然在发挥着他的重要作用。这一短片视频不仅显示出中医抗疫的成效，还增加了海内外观众对中医中药这一中华文明的认知，也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传统中医药文化价值观的认可和认同。

（四）从表达层面分析

表达层面主要以非语言媒体和语言媒体这两个媒体形式为主要对象，而合适的语言媒体不仅能对相应事物做出更加准确的解码和阐释，更有利于主动把握相互的定义权与解释权。纪录片中语言媒体的表现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中医药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离开汉语很难将中医药文化讲述清楚，用汉语讲好中医药故事，也彰显了中医药的文化自信（郭旭 2021：117）。节目借助话语互文策略，以中医药专家、主持人和患者三位一体的互动形式讲述了中医药全程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的故事，专家知识话语关于抗疫处方的药典来源，关于人类历史上抗疫抗疫故事和抗疫人物的介绍，主持人关于短片故事和新闻报道的视频超链接，患者对于自身中医诊疗经历的感受的讲述，这都凸显了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内涵。例如专家知识话语中刘剑锋主任介绍历史上中医药治疗危重症的方法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子近代葛洪的叫《肘后备急方》...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有名的诺贝尔奖的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屠老，获诺贝尔的屠老就是受这个启发，叫青蒿一握，绞汁服，然后治疟疾，它就是出于《肘后备急方》。”主持人话语与视频超链接的短片中介绍“东汉末年疾病频发，医圣张仲景撰写了第一部防治瘟疫的著作《伤寒杂病论》，唐代近300年间，仅记录在册的瘟疫就有21次，药物外用是当时瘟疫预防的重要途径，有佩戴、烧熏、涂抹、点眼、洗浴等。”这些语言媒体都增进了海内外观众对中医药知识的认知，加强了人们对于中医药文化的了解，建构起中医药的中华

传统文化载体，以此实现有效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交际目的。而在非语言媒体上，在视觉媒体上，整个纪录片充满了中国特色和中医药元素，从古籍和药典如《说文解字》、《中国疫病史》、《伤寒杂病论》的介绍，到抗疫组合方中所含中药配方的展示，都充满了中国元素和浓厚的中医药传统文化。在听觉模态上，在介绍中国历史上抗疫情况和古方剂时，背景音乐使用了管弦乐和管弦拨奏组合的音乐形式，在各种古典乐器的演奏中突出了纪录片的叙事感与历史厚重感。而通过语言媒体和非语言媒体的相互作用与配合，纪录片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美学文化便呼之欲出，更加强了多模态话语在表达层面的效果。

五、《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文化认同建构策略

法国思想家Foucault和Derrida（Foucault、Derrida 2017：61-62）认为语言，尤其是话语，对理解社会实践至关重要。不可否认，语言本身对内容主旨的表达、主题的呈现都有重要的作用，但对于电视纪录片来说，它不仅是语音和语言的输出，还包括声音以及图像，因此在对电视纪录片在做内容构建分析时要采用多模态思维方式进行。中国语言学家张德禄（2009：27）将多模态之间的关系分为互补和非互补，他认为典型的多模态话语模式是一种模态的话语不能充分表达其意义，或者无法表达其全部意义，需要借助另一种来补充，把这种模态之间的关系称为“互补关系”，而把其他的称为非互补关系，互补关系中分为强化和非强化，非互补关系中分为协调、联合和交叉几种。《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这档节目之所以能在众多医药类纪录片中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取得良好的宣传和传播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节目主旨进行了多模态协同建构。崔新建（崔新建2004：103）认为文化认同即群体之间共同文化的确认。文化认同的主体是基于共同文化根基成长起来的人们，要实现这一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要调动他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实现情感的共情和共鸣，进而引导共同文化价值的确认。《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这档中医药纪录片，其主旨是通过真实还原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所发挥的作用，来传递和弘扬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之感，通过多模态话语在纪录片中的应用情况分析，得出《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节目通过多模态协同的方式对文化认同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对文化记忆的唤起，对文化情感的激发以及对文化价值的彰显。本节就这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各个模态之间如何协同构建文化认同。

（一）历史解说和历史场景唤起文化记忆

张兵娟和李涵（张兵娟、李涵2022：49）认为文化记忆的重构离不开媒介的作用。电视媒介以其视听兼备、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优势成为文化记忆重现和传播的载体。冯亚琳（冯亚琳2012：48）认为文化记忆的本质在于其可塑性和可构性。因此，《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节目通过中医药历史故事的解说和重现能够实现中华儿女对于中医药历史起源和发展故事的历史记忆的激活，对共同历史文化认同感的唤起；通过历史场景化的表现形式，让观者感受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神圣。

1. 音响和背景音乐烘托气氛

声音是电视节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声画的配合能更好地展现、传达内容，在《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第四集《悬壶抗疫有中医》中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历史起源和中医药在历史抗疫中的作用的介绍中，音响和音乐对于故事的解说和历史介绍起到了重要的烘托作用。该节目的基调是中医药文化纪录片，旨在真实讲述和传播中医药文化的起源和在现代疫情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介绍中医药文化，那么节目中的配乐就要彰显民族文化。在介绍过去几千年里古人是如何看待病毒并如何与它抗争的时候，视频抗疫画面、旁白台词和古典背景音乐一起共同协同作用，达到了传递中医药历史厚重和神圣的文化信息的作用。

2. 画面布景与解说词还原历史故事

《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是在整合了历史资料和中医药文化真实信息后进行的合理呈现。画面中的关于中医药抗疫故事的讲解以《说文解字》中关于疫字的介绍作为开篇，随后逐次介绍了《中国疫病史鉴》、《中国疫病史》、《伤寒杂病论》等中医药典籍。古色古香的古代文字书写的中医药典籍、典籍中跃出的仿佛带着中草药清香的中医方剂的呈现和烧熏等中医疗法的介绍，都一起把人们带入了中医药的历史和厚重抗疫文化中，这些画面布景呈现结合解说词一起都增进了海内外观众对于中医药知识的认知，加强了人们对于中医药文化的了解。

中医药古籍和古代抗疫画面图片模态和解说词语言模态一起构成非强化关系中的联合关系。历史化还原式的布景以及历史场景的复现式呈现，解说词中也体现了中医药历史发展的鲜明历史文化印记，揭示出中医药文化的深厚渊源和历史厚重感。这两种模态之间的联合，从图像和语言两个方面共同构筑起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抗疫故事，加深了国人对于中医药文化的文化记忆。

（二）文化符号和亲近话语表达激发了文化情感

张宁、段小宣等（张宁、段小宣、杨帆、袁勤俭 2022：41）认为文化认同所引发的情感是复杂的。文化认同的情感维系主要关注对文化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等。武楠（武楠2018：88）认为继承并重构民众对于某一集体文化的价值认知和当代情感，在这种文化记忆的传承和重构中，生活在各种文化冲击和文化刺激中的大众得以不断形成身份认同，并培植立足当下的民族情感。在《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节目中，文化情感的激发是通过文化符号的传递、视角距离的拉近以及方言文化共情来实现共同意识的打造，基于对共同文化的认同进而激发起对本民族的文化的归属和自豪的情感。通过图像模态和语言模态之间的协调、联合的非强化关系，进行文化信息的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激发人们的中医药文化情感。

1. 历史文字和服饰符号传递情感认同

节目中呈现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时代的中医药典籍是由不同时期的文字所撰写而成的，这些文字符号背后，蕴含的是悠久而又独特的中国书法文化。此外，节目中还出现了不同时代的民族服饰，人们在民族服饰上佩戴中医药抗疫工具如艾草制作的香囊等。观众在欣赏到古代传统服饰的精美后，也会加深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认同。

2. 平视视角拉近互动距离

《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节目虽然有多个视角的呈现方式，但平视视角仍占节目主体，通过平视视角能让观众体会到交流互动感，增强节目的亲切感。由于疫情时期的特殊性，节目以现场嘉宾采访和主持人连线为主，这种平视第一视角营造的氛围，拉近了观众和中医药专家、抗疫一线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距离，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交流感。

3. 方言和地方特色方剂引发身份共情

汉语普通话是中国的官方用语，这一语言背后也蕴藏着中国独特的语言文化。

《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节目使用普通话作为主要语言表达形式，满足了各地观众对于节目内容的理解需求。但同时，正因为中国地域辽阔，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域人们为方便内部人群交流，也衍生出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类型，那么各地的方言的呈现也体现了地域性的文化归属。纪录片中不同地区的人们使用着不同的方言来讲述中国抗疫实践和抗疫故事。从纪录片中能看到不同地方特色方剂的使用如广州根据气候特点所研制出的预防和抗疫方剂。在现场连线时，河南、甘肃、和江西等省的对于中医药方剂的改良和创新也都体现了强烈的地域特色。普通话穿插方言的方式能引起不同地域人们的共情，进而回归到对共同身份的认同。

（三）多景别镜头互补凸显文化价值

文化认同的形成在经历文化记忆的唤起，文化情感的激发之后，就要回归到文化价值的传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0：23）确立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理论”，该理论提出：大众传播必须以推动国家发展为己任；满足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需求；在内容上应该优先传播本民族文化，推广本国语言。作为一档中医药文化纪录片，《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在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同时更要担负起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在文化价值的彰显和塑造中助力和推动海内外观众对于中国国家文化的认同。《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通过特写镜头来展现古代中医药典籍和中药方剂。在近距离观看细节设计精巧的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其背后体现的文化价值。如在第四集《悬壶抗疫有中医》中，节目详细近距离展示了唐代的药物外用是当时瘟疫预防的中药途径，如佩戴、烧熏、涂抹、点眼、洗浴等。这些细节让我们了解到古代人们的智慧，也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医药文化的厚重。如果说近景和特写是通过细节来呈现中医药古籍和抗疫方剂的精妙之处，那么远景、全景和俯镜头则体现了整个中华大地的抗疫情景和各地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患者的真实抗疫景象。这些多景别镜头的互补运用，既凸显中华医药的历史厚重与庄严，也蕴含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的中国民族抗疫精神和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的文化价值和内涵。

结论

（一）中医药纪录片的文化认同建构策略

本文以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为基础,从文化层面、语境层面、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对中医药纪录片《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探究纪录片的文化认同建构策略。《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通过多种模态的互相协作及灵活排列和运用,从中医药文化记忆的唤醒、中医药文化情感的激发以及中医药文化价值的展现等三个方面来实现了纪录片的文化认同构建策略,纪录片中背景音乐的选择、专家话语和视频短片配音解说以及介绍中药古籍的视频画面都进一步还原了中医药背后的悠久历史故事,唤醒了人们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的记忆,各地方言讲述的中医抗疫实践故事以及各地地方抗疫方剂的应用都强烈地激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古方今用显身手,从古代到现代,中医药这一古老的中国文化瑰宝一直在抗疫斗争中展现着作为中华文明精神的文化价值。在多种模态的综合运用下,从中医药文化的认同认同到地方地域文化的情感共鸣再到民族文化的彰显和凸显,中医药文化类纪录片的文化认同建构模式被一步步建立起来了。

（二）本土和地方城市宣传片制作的启示

对中医药纪录片这种典型性的优秀媒体视频资源的分析也对本土和地方城市宣传片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与指导作用。对纪录片媒体资源进行分析,可以通过语言来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特征和内涵,从而增强文化的认同感,提高民族的凝聚力,进而达到文化从认可到传承的转换,在制作文化宣传片时也要注重使用传播地域文化的合适的叙事语言。在注重宣传片的叙事语言的解说基础上,注意语言与非语言模态的综合运用。通过视觉模态、听觉模态和语言模态的相互配合和分工协作,从文化、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全面地构建地域文化认同,从而提高地方城市宣传片的表现力和叙述性,为受众提供更丰富的情感体验和饱满的叙事体验,从而提高本土和地方城市宣传片的对外文化传播效果,增强人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同时,在传播地域文化初衷前提下,要注意历史文化的传承与现代的创新应用,探索历史,关照现实,从而提高地方城市宣传片的宣传力度与广度。

（三）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的启发

本文对《中国话医药 抗击疫情》进行了多模态话语分析,解读了中医药文化所折射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多模态话语视角下的中医药类纪录片的文化认同建构策略。

《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的语言是中文语料,在外语教学方面,可以更多地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纪录片中的文化信息相关话语视频可以作为利用精选文化视频进行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典型外语教学案例,这对如何利用优秀视频资源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有着积极的启发和启示作用。按照从知识到意识再到能力的发展模式来培养外语类学生对跨文化的理解、认识和分析、表述与传播的跨文化交际与传播能力。这种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分析视频内容,解读文化信息和内容,学习多模态话语手段的排列组合和灵活运用,解读视频叙事方法和策略,最后通过视频分析方面的练习和短

小的文化视频拍摄作业来学习如何灵活应用跨文化知识、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发展跨文化交际和传播能力。

（四）从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启发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中医药在保障人民身心健康和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形势下，用好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可以以介绍中医药医疗保健方法与手段为内容载体，全面促进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有效促进世界各国人民了解和学用中医药的积极性和热情，深化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明更好走向世界。中医药学来自中华文化母体，生于并融于中华文化，是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中医药在中国疫情防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实在在地为弘扬中医药文化、进一步彰显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动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和推广能力，必然会极大地推动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快速提升。

参考文献

- 陈静雯，2023，《多模态视角下纪录片字幕翻译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以武汉战疫纪〉为例》，未出版硕士论文，荆州：长江大学。
- 崔新建，2004，〈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页103-108。
- 董艳，2007，〈国外话语研究最新进展〉，《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第1期，页61-62。
- 冯亚琳，2012，《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48。
- 付玉，2022，〈讲好抗疫故事：《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叙事范式分析〉，《技术创新》，第14卷10期，页81-83。
- 郭旭，2021，〈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的互文性与身份建构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28期，页105-117。
- Halliday, M.A.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 pp.60-83.
- Kress, T & van Leeuwen T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20-45.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传播研究委员会，1980，《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页23。
- 刘晴文，2022，〈模拟交传中的记忆困难与应对策略——央视纪录片《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口译实践报告〉，未出版硕士论文，大连：辽宁师范大学。
- 龙菲，2021，《纪录片〈我们这五年〉解说词的语用策略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 罗泽君，2021，〈如何做好中医药的文化传播工作——以《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特别节目为例〉，《新闻传播》，第8期，页90-91。
- 王蒙，2013，〈〈试论〈舌尖上的中国〉的文化价值〉〉，《传媒与艺术：新西部》，第12期，页86-95。
- 武楠，2018，〈融媒体时代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的转型与超越——以央视〈国家宝藏〉为例〉，《中国电视》，第4期，页88。

张兵娟、李涵，2022，〈七夕奇妙游〉对文化记忆的浪漫想象与当代重构〉，《新闻爱好者》，第5期，页49。

张德禄，2009，〈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中国外语》，第6期，页24-30。

张宁、段小宣、杨帆、袁勤俭，2022，〈青少年弹幕评论中的文化认同——以某视频网站作品〈国家宝藏〉为例〉，《青年研究》，第3期，页41。

张洋滔，2023，〈电视节目《中华医药 抗击疫情》模拟交替传译实践报告〉，未出版硕士论文，济南：山东财经大学。

赵一，2022，〈纪录片〈同心战“疫”〉中家国情怀的多模态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济南：山东师范大学。